

孟志东 主编

达斡尔族研究

第三辑

内蒙古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民族宗教事务处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古籍办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古籍办

一九八九年·呼和浩特

达斡尔族研究

第三辑

孟志东 主 编

内蒙古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民族宗教事务处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古籍办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古籍办

一九八九年·呼和浩特

达 斡 尔 族 研 究

第三辑

内蒙古托克托县印刷厂印刷

198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内新图出准字(89)第112号

每册：1.80元

前 言

一九八七年，我们为了促进达斡尔族研究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编印了《达斡尔族研究》第一辑、第二辑，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今年，我们出于为研究达斡尔族的学者和各界研究人员提供资料、融汇和总结近几年来达斡尔族研究成果，推动达斡尔族研究事业发展的愿望，编印了《达斡尔族研究》第三辑、第四辑。该两辑是由孟志东同志负责主编的，毅松同志在查找资料方面给予了协助。

《达斡尔族研究》第三辑，专门从国内正式或内部出版的历史书籍中摘编了十七世纪以来外国记述达斡尔族方面的历史资料，其主要部分是摘自俄罗斯（苏联）等国学者编写的史书、考古调查、旅行记等，并收入了在国内正式出版的期刊中发表的日本等国学者的几篇有关达斡尔族研究的文章。十七世纪达斡尔族的社会历史情况，是达斡尔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内史籍对其记载目前发掘到的甚少。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辑以摘抄的形式汇集了国外的研究介绍资料。本辑资料，内容较广，涉及达斡尔族研究的各个学科。有些资料之间虽有相近之点，但其中很多情节和评述也不尽一致，这对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和研究当时达斡尔族社会历史的概貌是有裨益的。对于外国作者的有些错误观点和提法，我们相信读者同志们是能够加以分析、辨别的。在摘编过程中，对于原文的某些名词和明显的错处，我们加了必要的注释。

《达斡尔族研究》第四辑，主要汇编了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书刊上发表和收入的有关达斡尔族的研究文章，以及提交学会第

四届年会的论文和资料，另有几篇短文转摘自学会主办的《达斡尔人》报。选入本辑的文稿，包括了历史、族源、人物、军事、经济、语言、文学艺术、文化教育、婚姻家庭、风俗习惯诸方面的内容，以及学术评论。选用提交第四届年会的论文和资料时，文字上作了必要的修改。

《达斡尔族研究》第三辑、第四辑，是由我学会同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民族宗教事务处、呼伦贝尔盟古籍整理办公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古籍整理办公室合作编印的。在此，我们谨向给予合作和大力支持的单位和部门表示衷心感谢。请各位读者对于书中的不正确之处给予指正。让我们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共同为达斡尔族研究事业的深入发展作出努力。

内蒙古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

一九八九年十月于呼和浩特

我想，契丹人的国家存在多种语言，有多种氏族和种族成分，其中从建立政权的契丹人起，直至女真、渤海、涅夫赫（居住在阿穆尔河下游一带和库页岛北部的民族——译者）、汉等人民各操自己的不同语言，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是契丹国具有自己独特的和基本上统一的一种国家语言，也是无疑的。法国的伯希和、美国的劳弗尔和匈牙利的李盖提等学者，很早就在他们历次发表的著作里表明，他们认为辽的国语属于蒙古语族语言中古老的一种。作为他们的意见的根据不但一直保存在汉文的文献之中，而且从已经得到可靠解读的一小部分基本词中，可以举出表示“五”、“百”等意义的数词和表示“猛禽”、“太阳”、“月亮”等意义，只能从蒙古语族的角度才能获得解释的词。由于这些词是词汇中颇为重要的成分，因此把它们解释为借入非蒙古的契丹语中的近似蒙古的语词，是说服不了人的。表示“铁”这个意义的一个独特的契丹字的来源，也已由李盖提院士在他早就发表的一部著作里作了详细的说明。以Ka Ⅲy的形式复原了其读音的这个有趣的词，现在只在嫩江的达斡尔人的语言中才能碰到，这是达斡尔人源出契丹的一个重要证据。

现在需要补述一下，上面说过最近找到了证明契丹语属于蒙古语族的、从目前来说是唯一的、但是却很重要的证据，那就是“五”这个词（“𠄎”——译者注）单写的时候是一个意符，但当这个符号出现在“兔”这个词（“𠄎”——译者注）中时，就成了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符号中的第一部分，换句话说，它成了第一音节的音节符号了。就象早就知道的那样，契丹语中“五”读作“Tay”，或犹如现在的达斡尔语中的“Taa B”，“兔”读作“Tay Л”或“Tay ЛИ”。

摘自〔匈〕卡拉·捷尔吉：《论契丹人的两种文字体系》，载于《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1期，陈乃雄译。原载《第三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论文集》，第二卷，乌兰巴托，

1977年出版)

关于达斡尔是作为契丹古老姓氏之一的大贺氏遗裔问题，历史学家们作过很多记述^①。苏联民族学家耶·莫·札尔金特支持了这个观点^②。

①〔蒙〕博·巴格那：《契丹问题》，第23、41页。

②耶·莫·札尔金特：《契丹及其族属》，载于《苏联民族学》，1948年，第1期，第55—60页。

摘自〔蒙〕贺·佩尔列：《契丹和蒙古的关系》，第17页，乌兰巴托，1959年)

我们谈一谈下列一些因素，这是和畜牧各部族的先前的关系所表明的因素。不久以前，这些鄂温克人中有些人是把马的图画安放在坟墓里的。在传说中它们的主人公往往以马为食物。在所有的传说里主人公都是从拥有许多马和牛的部落里娶妻的。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即有一个族名——德力根奈依，有时是女子的称呼，有时是男子的称呼，有时是主人公自己的称呼。如果把主人公固有名词的特征语尾奈依（НэЙ）（如阿尔塔奈依、希尔布奈依、穆丘奈依）去掉，那么留下的便是德力根。我们认识德力根这个族名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的（在十七世纪的时候，达斡尔族阿尔丹哈拉中有德勒根莫昆的人们。在汉译时，勒、日、里、力、尔等字，往往是相互代用的。——编者）。德力根人的名称见之于1692年由威特先出版的鞑靼图。德力根部落的人们最先把恢复了因中国人破坏的阿尔巴津城的消息带到齐齐哈尔来。亲自调查这一民族和报导他们情况的最早的旅行家伊斯布兰德斯·伊迭斯。按他的说法，这是个向中国进献贡品和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的独特的部落。这一部落的人很会射箭和操与通古斯语相似的语言。根据伊斯布兰德斯·伊迭斯的同行人布兰德特的报导，俄国达呼尔的通古斯人承认自己是和塔尔加津人或达呼尔人同一氏

族、起源相同的。施连克承认他们是达呼尔人的一支，比起达呼尔人本身他们更多的以狩猎为业（见施连克：《关于黑龙江边区的异族》，卷一，174—176页）。

伊迭斯的描写和指出语言相似的说法和有关德力根奈依的传说的资料是相合的。最近鄂温克人还能和他们（德力根奈依）自由交谈。德力根奈依的祖先拥有许多牛和马，但是他对鄂温克人的勇士则抱着仇视的心情。

也许这些德力根奈依人——托尔加津人就是象马涅格尔人那样的操通古斯语的群体，也许他们就是达呼尔人部落的氏族。达呼尔人部落沿着泽雅河系统一直分布到雅布洛诺维依山脉（外兴安岭）——朱格朱尔山脉，并在苏塔姆河支流（乌楚尔河系统，阿尔丹河右支）的名称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现在，达呼尔语是属于蒙古语的，但是达呼尔语中的一些鄂温克单语是和黑龙江上游的土语相近的（例如鼠是 А Ч И К Ч А Н—А Ч И Х Ч А Н，黑龙江土语是 А Ч И К И Ч А Н；狼是 Г Ё С К Э；胸、胸廓、背是 К Э Н Г Э Р，黑龙江土语是 К Э Н—Т Ы Р Э；老鸦是 О Ч И），达呼尔祖先是和黑龙江上游的通古斯人有关系的。

东方群体和操突厥语的诸部落以及和操蒙古语的诸部落，因而和契丹与达呼尔人的祖先的关系最为密切。关于这方面补充一些我们在1948年秋天所蒐集的有关鄂温克人埃德扬的资料不是没有兴趣的。埃德扬——埃德让按中文的史料是在十二世纪从黑龙江下游的地方迁到北方去的。现在他们的后裔住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区的楚米坎区、库尔——乌尔米区和上布列因区，比较小的一部分住在萨哈林岛（库页岛）和阿穆尔省的上谢列姆札区和泽雅——乌楚尔区。我记录了各地有关埃德扬的传说的异文。在记录乌尔米和阿姆贡的埃德扬的传说中常常提到契丹，契丹国 К И Д А Н—К Е Д А Н 和契达——契达克氏族（К И Д А—К И Д А К）。这个国家座落在大森林狩猎人地区的东方。传

说的主人公——森林里的猎人既没有驯鹿也没有狗。他们出征了，向大河的源头走，翻山越岭，向着东方移动。他们中有些人走“契丹国边区”，“契丹国”是和奥那国、锡韦尔国一起被提到的。

摘自（《民族史译文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Г·华西列维奇：《关于契丹与通古斯人的问题》，原载《苏联民族学》，1949年，第1期）

为了确切了解契丹的族属问题的全貌，必须初步解决有关达呼尔人和索伦人的起源问题，这些人在其他民族中间是处于孤立的地位的，他们的历史在最近一世纪是和外贝加尔湖地区的鄂温克人（即通古斯人）的历史紧密交织一起的。……

虽然达呼尔人和索伦人一直生存到今天，但是关于他们的研究是异常缺乏的。甚至有关他们的族属问题在不久以前即终止继续讨论的时间依然是意见分歧的，因为从语言资料方面说毫无疑问达呼尔人是属于蒙古人，而索伦人是属于通古斯人的。但是在民族学和历史学方面，无论是达呼尔人或索伦人的研究在今天也不比第一批的耶苏会士旅行家的时代为多。散见于各种著作中的有关他们的报导是偶然的、片断的和往往不完全确切的。虽然不止一个研究者企图把他们的过去与这一或其他的民族联系起来，但他们的起源依然是模糊不清的。许多西欧的学者把他们看作是蒙古和通古斯“混种”契丹的后裔。这种见解的根据是民族概念与政治概念的混同。由于一个民族因其他两个民族混合的结果而产生，后来，即两世纪后衰微了重新再分解为两个组成因素，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记起，古代东方国家是以占统治地位的部落名称来命名，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应该从达呼尔人和索伦人对契丹帝国的某种关系来理解有关索伦人和达呼尔人起源于契丹的许多史料的提法？……

注意契丹语的两作者即哈奥斯和白鸟库吉归结到这一点：达呼尔人和索伦人都是起源于契丹的。但是两者的结论的根据都

是不一样。白鸟通过东胡把索伦人和达呼尔人直接和匈奴联接起来。他写道：东胡族不是别的民族，就是匈奴种族的一支，两者都是操包含有蒙古语和通古斯语在内的混合语。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隆尼河流域找到了这两个民族的踪迹。前者今天被称为索伦人，他们的语言是以通古斯语占主导地位的通古斯语与蒙古语的混合体。最好是把他们和通古斯人的集团联结一起。后者是被称为达呼尔人，他们操半蒙古语和半通古斯语，其中以蒙古语占主导地位的语，他们可能和蒙古集团的民族相关。总之，结论是匈奴和东胡是与索伦人和达呼尔人血缘相近的两个民族，他们可能就是索伦人和达呼尔人的祖先。关于索伦人和达呼尔人的血缘与匈奴和东胡相近一结论是和白鸟有关的早年的说法有矛盾。其来源无疑的是应归结于日本科学界帝国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在白鸟的历史观中鲜明的表现出来了。

哈奥斯的假设是建基在非常突然的承认达呼尔人仅为索伦部落之一的一点上。因此他的任务局限于证明就是这个部落按他的意见即索伦部落属于契丹的。哈奥斯写道：“象……有关索伦人和契丹关系的证据所指出，我能提出在索伦人中间主要的部落是被称为达呼尔人的。”同时他引证雅金夫的下面报导：第一个契丹王朝的奠基者是名叫做达古尔的人，叫这王朝为达贺的 *Visdelou* 也证实这一点。这一或别一占统治地位的部落的保存在哈奥斯看来对于作出这些民族本身是同一的结论是很可以使人信服的。哈奥斯的理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的，自然是不能认为令人满意的。再者他的论据对达呼尔人起源于契丹有利的论据依然有其价值。

利特尔的下面的主张是决不能赞同的：“根据一切事实说，这些达古尔人、打虎尔人、达奥尔人、朵尔人、达尔哥津人、麦尔健人，就是那些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零散的通古斯部落，他们在俄罗斯人来到西伯利亚之前，就离开黑龙江上游地区来到中游地区和此时团结为一个满洲族的各部落相毗连，但

是其他的比较他们野蛮的通古斯氏族则迁徙到富有古迹的俄国的达呼尔去”。这是错误的，除了上面指出的达呼尔人是蒙古人之外，因为还有俄罗斯人发现达呼尔是已完全成熟的农业部族，甚至在最早的哥萨克文书中他们很少和通古斯人混同一起的。利特尔也主张女真和达呼尔人是同一的理论。譬如他断言：这些女黑和女直……按语言和部落起源来说是和达呼尔人近似的。……

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当时居住在受大辽支配的土地上的民族是哪一个是完全适当的，其时代可远追溯到契丹，即这个帝国的统治民族。战争破坏后，一个民族从他们从前居住过的地方完全消失了是难以想象的。自然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即古来住在西满洲和最近对通古斯还保持其支配地位（根据较后时代的经济从属关系）的达呼尔人是否即契丹的后代？在文献上指出达呼尔人的方言是古老的，这一事实大概是证明达呼尔人迁移到东方是很早的。达呼尔人本身也同样地认为他们的语言是古老的。绝大多数的作者都把达呼尔人看作是契丹的遗裔，但是也存在着其他的意见，根据这一意见他们来到满洲是属于十四世纪蒙古入侵的时代的。

史禄国引用过的、叙述达呼尔人还在契丹时代以前迁往石勒喀和阿尔昆河流域的达呼尔传说除少数例外，比起其他的东蒙古部落，较早迁移的达呼尔人的确凿证据是他们极为出色的生产方式。他们的农业达到很大的发展以至于在他们的经济上起着主导的作用，而有别于畜牧民蒙古人的。

总之，认为达呼尔人是居住于大辽境内的契丹的遗裔是有根据的，在一定的条件的影晌之下（企图规定那些条件是个太冒险的职务）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类型，从游牧的畜牧业向农业过渡。

施密特（P. Schmidt）进行了远东土著语言的比较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通古斯语中头一个 X 音相当于满洲语中的 Φ 音，哥尔特语和奥里奇语中的 ΠB 音，但在蒙古语中则缺乏

这个”。在现代蒙古方言中缺乏发声的h音，是伯希和教授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的古蒙古语中发现的。按年代来说，可以推测的古蒙古语形式和在西通古斯人和北通古斯人以及某些古老的达呼尔方言中保存下来的契丹语形式，已在贝加尔湖沿岸的和涅尔真的通古斯人以及蒙古人中间消失了。

摘自《《民族史译文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E·札尔金特：《契丹及其族属》，原载《苏联民族学》，1948年，第1期）

《魏书》记今洮儿河作太鲁水，亦作太徐水，又《北史》亦作太岳鲁水，元代记录记此河作塔兀儿或托吾儿，其原名为 Tagur 或 Daxur，据《金史国语解》，Solon语谓耕种者曰达胡里（Daxur），太鲁水（塔兀儿）之名与此同语源也。又与索伦杂居之 Daxur人，中国人译为达呼尔或打虎儿，是此名称或亦与洮儿河有缘故也。

摘自〔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版，第50页）

依广中少佐及岫井中尉之向导，二十三早晨往新市街，观一庙，此为老爷庙，即关帝庙，建筑极宏壮。在今日蒙古已襄，有此汉人庙宇，固不足怪。但以蒙古沙漠地，而有此恢宏之老爷庙，为蒙人思之，不胜今昔之感。庙中有光绪十三年所铸之钟。出庙后即访呼伦贝尔衙门，以表敬意，与副都统成德氏（成德未曾任过副都统，而是任过副都统公署左厅厅长职务。——编者）相会。氏亦为多尔人（这里指达斡尔人，以下同。——编者）。呼伦贝尔之政厅，设于海拉尔，附近一切土地人民，均由此政厅所支配。成德氏年约五十，虽为多尔人，然既能蒙语，亦能汉语，通满文，亦通汉文，且能赋诗，盖文人之骨而兼政治家之绅士也。多尔人自昔本有文才，与蒙古人绝异，大有官吏之风。即如效忠

于成吉思汗之耶律楚材，亦为多尔人。多尔人昔为契丹，即辽之子孙，彼等亦自言之。

……属于呼伦贝尔政厅之人类，有种种民族。例如多尔、索伦、奥洛匈（指鄂伦春。——编者）、巴尔喀（指巴尔虎。——编者）、蒙古、爱留德（指额鲁特。——编者）、孛里亚（指布里亚特。——编者）等相集，而立呼伦贝尔政厅。就此而言，颇多兴味，兹拟略述之。

呼伦贝尔政厅云者，系兴安岭以西，以海拉尔为中心，包括其周围地方之称。即北至黑龙江流域，南至贝尔池之地带。以地理言之，为海拉尔河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流域。其地，一方面接俄领东部西伯利，一方面在北满洲黑龙江省与外蒙古之接合点，而成所谓三角重心点。职是之故，为各民族接触之中心，政治上、经济上，其关系颇为复杂。此处所以设呼伦贝尔政厅者，为清宣统三年，即一九一一年，满廷将亡，所谓塞外民族，颇觉动摇，蒙古人先为独立运动，此地之民众，亦复继起故也。其运动，俄国官吏，本在背后牵援助之丝；遂于一九一五年，由驻北京之俄使喀鲁奔司器氏，与民国外交部交涉之结果，于民国四年，缔结中俄条约，其中有所谓呼伦贝尔政厅，中国亦公然承认矣。

至于呼伦贝尔政厅，由中俄条约，有如何权限？其表面，尊重中国之主权，直接与北京中央政府有关系。但与黑龙江之督军省长，丝毫不涉，当然不受其支配。别设一官曰副都统，支配其政厅。与中国各省长官，有同等之权力。此职以多尔人曰胜福者充之。其租税，除某种之外，政厅皆可自由征收使用。纸币亦以政厅独立之权发行。布令示达，可自由行之。其军队以政厅所辖民众组织，使之维持治安，不许其他干涉。万一有非常之变，仅以本厅兵力，不能防御时，副都统可商诸黑龙江省督军，请其出兵。乱定后，他省客军，同时即须撤退。……

政厅之官制，于前述副都统管辖之下，其长官左厅为成德

氏，右厅为巴额巴拿氏。此外有印务局、交涉局、税务局、巡警局、巡防局等公所。……

其地域内之人口有若干？据彼等所言，有三万之谱，果有此数与否不可知，多算之，亦不过三万。此政厅，自国际学上思之，或自人类学上思之，所谓极饶兴味者，以其存在于中俄之间；而其民族，由一种与其他相异之民族合成。即三万人内外之民众，由何等人类成立？如前所言，由多尔、索伦、奥洛匈、爱留德、孛里亚、巴尔喀等，多数所成立者。此等民众之中，为呼伦贝尔政厅之中坚者，即多尔人。自前记之副都统胜福，余所会见之左厅长官成德，下及职官之重要者，皆多尔人，握其权力。此实大可注意之点也。盖所谓多尔人，即契丹之遗种。于附近之乌拉尔阿尔泰民族中，为最长于政治天才者。与其他蒙古人、奥洛匈人、索伦人等，性质完全不同。契丹在中国五代，即日本醍醐天皇时代，崛起于此附近。后建辽、金、为压迫宋朝之雄族。文化亦相当进步，其后裔即多尔人也。即为历史上知名之民族，故虽至今日，多尔人较之附近民族，实富于才能，长于智巧，而举有相当之成绩焉。

胜福老而多病，实际不能柄政，左厅长官成德氏代之，统辖一切政务。此人前已言之，与胜福俱能通中国及满、蒙文字，能属文，亦能通语言；与俄、日人为对手，善于交涉，一无遗憾，为头脑明晰之人。可谓为发挥多尔人特色之代表的人物。元朝在崛起于蒙古之时，其人勇猛绝伦，长于战斗；至于文治，则茫无所措。以此之故，擢用契丹遗民，即辽、金落伍者之耶律楚材氏。而元朝文治方面，因而具有成绩，此历史上所显然者也。性格如耶律楚材者，今之多尔人亦有之。自呼伦贝尔政厅之首领，以及其他要职，几尽为多尔人所占，初非偶然，此亦不能不注意之点也。

夫然，则多尔人，于政厅管内三万人口中，果有若干？实不过三、四百人。若此少数之民族，握呼伦贝尔政厅之权力，可以左右之，信为富于兴味之事实。……

海拉尔即呼伦贝尔政厅之发祥地，远自清朝未征服此地以前。作为辽之遗民，所存在之多尔人，以清朝灭亡为机会，举独立之旗，诰誓中国人以外之民众，而在俄国指挥之下，立呼伦贝尔政厅。不幸其基础未固之中，俄国一朝瓦解，不能得其后援；同时中国乘俄帝政之崩坏，开始在北方活动。一九一五年之中俄条约，成为废纸。中国兵侵入海拉尔，强制呼伦贝尔政厅取消独立。多尔人之雄图，不遑作先祖辽帝国之梦想，而归于水泡。此时外蒙之自主，亦由中国之强压而取消。塞外民族，遂如旧日，臣服于中国；……

搭轻便铁道，于齐齐哈尔站下车，沿中东铁道线路，向西方多尔人之村落。此处名为昂昂溪，户数凡二百五十。其房屋与齐齐哈尔之满人相同，草房而上列千木，前树神桅，室中有小儿摇篮，室外有砖瓦之烟囱。女子风俗，一如满洲，亦见两把头。此处旗人房屋，建筑愈旧者，愈为满洲式。……昂昂溪村为满人与多尔人杂居之地，附近之中国人，称之为多尔村，实则不然。但其先，多尔人实为主体，而满人后入者。……

齐齐哈尔街市及附近一带，本为多尔人之村落无疑。现在附近之地名，尚有不少为多尔语者。匪啻齐齐哈尔，凡嫩江流域，均为多尔人之根据。满人来自东方，征服其众，开辟齐齐哈尔城，使其军民移住，故多尔人遂与满人杂居。多尔人自为满洲所征服以来，编入旗籍，而入于八旗之中，完全为满人所同化。但昔之多尔人，必于嫩江流域，盛为分布无疑。其北有索伦人。昂昂溪之地名，意亦为多尔语之仅存者也。

博物馆（即海兰泡市博物馆——编者）亦为黑龙州地学协会之附属。不仅人类学、考古学而已；其他科学之物，亦有陈列。其陈列品中，关于余所专门者，规模甚小，可分为二。一为土俗

学，一为考古学。土俗Ethnography方面之陈列，以耶克脱人之物为多。此外则有示多尔人巫女之风俗者。……余所尤以为难得者，为以生活模型，示多尔人萨满女巫之风俗。其模型大小，适与人体相等；有首饰，着衣裳，持器具，皆即用其实物。此等皆大可参考。余由此知多尔女巫之大概。在今日多尔人益为中国化，失其固有之俗；此处之博物馆，系旧日所采集者，较可见其固有之遗风。多尔人萨满女巫之风俗，及其仪式、器具、祈祷之状，依此模型可得而言之。此为馆中唯一之土俗品，以为异常重要也。此种多尔人，不在黑龙江方面，而居于中国黑省嫩江流域。彼等佩镜之状及其首饰，更有胸次及身体上其他装饰，均足示多尔人之古风，甚为有趣。最足动人之土俗品，盖即此多尔女巫之模型也。

……自黑河至爱琿，中有七八华里，殆尽为冲积层之平原；因地方而略有丘陵起伏，为荒寂之地。出黑河后，约八华里之间，全无人烟。过此，始有村落，约二十户，名曰哈拿屯，为多尔人部落。其房上立有千木之状，与余在齐齐哈尔附近所见多尔人家相同。观该地妇人，亦与满洲人无异，梳两把头，着长衣而为天足。远望其树有千木之房顶，有如在日本之感也。

摘自〔日〕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述，商务印书馆，1925年）

1693年，特罗伊茨克的色楞格斯克寺院的修道院长费奥多西曾提到寺院农民和“异地”妇女结亲的事。基督教会只允许“教徒”之间结婚，但这一规则遭到了破坏。1683年，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大主教鲍维尔注意到，“许多达斡尔居民……与异地非教徒住在一起。”（《东西伯利亚边区古代的教会文书》1653—1720年，喀山，1875年）

外贝加尔地区的一些大牧主拥有4千匹马、3千头牛、1千只骆驼、8千只绵羊和数百只山羊（И·Г·戈奥尔基：《俄国各民族记述》，第4部分，第29页。圣彼得堡，1799年）。戈奥尔基报导，巴尔古津的一个牧主拥有5百匹马、5百只绵羊、3百头牛和不少骆驼及山羊，他的财产（现款和中国银子）有4千卢布，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大一笔数字。据戈奥尔基证明，外贝加尔的一些达斡尔族牧主积蓄了“数十万中国铜钱或带印记的中国银子，这些钱是他们在没有禁止把牲畜卖给中国人的时候挣来的。”（И·Г·戈奥尔基：《俄国各民族记述》，第4部分，第29页。圣彼得堡，1799年）

摘自（〔苏〕符·阿·库德里亚夫采夫、格·恩·鲁缅采夫等著：《布里亚特蒙古史》，高文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8年。）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沿岸住的是达呼尔人及与其同族的部落。十七世纪时，达呼尔人就已经有高度发展的文化。他们定居在乡村里，从事农业，种植五谷，栽培各种蔬菜和果树；他们有很多牲畜；还有从中国运来的鸡。除种庄稼和牧畜外，猎取毛皮兽，特别是当地盛产的黑貂，对于达呼尔人来说也相当重要。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富饶吸引着相邻的中国封建主，他们强迫这一带居民用貂皮向他们缴纳贡赋。每年中国的课税吏都要到这里来，中国商人也带着商品同他们一起来。达呼尔人可从中国人那里买到丝织品和金属品。因受中国人的影响，他们也开始建筑有窗户的好房屋，窗子上不用玻璃，而是糊上一层薄纸。服装也学中国的式样。

达呼尔人有设防很好的城市。

摘自（〔苏〕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一卷，山东大学翻译组译，第43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